

## 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

——阿米塔夫·高希访谈录

金万锋 译

### 【简介】

**受访者：**阿米塔夫·高希，印度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代表作有朱鹭号三部曲《罂粟海》《烟河》《烈火洪流》等。

**采访者：**马哈茂德·库里亚，莱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印度洋及东南亚地区研究。

**Interviewee:** Amitav Ghosh, Prestigious Indian writer,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Sea of Poppies*, *River of Smoke* and *Flood of Fire*.

**Interviewer:** Mahmood Kooria, PhD candidate in Leid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Indian Ocean and Southeastern Areas.

**【访谈者按语】** 2012年10月的第一周，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抵达阿姆斯特丹，参加由欧洲文化基金会（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举办的学术会议“歧路与聚合：欧洲与地球的未来”（Confluence and Crossroads: Europe and the Fate of the Earth）并做了主题发言。高希毕业于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凭借探索历史联系与跨地域特征的虚构性作品而闻名于世。高希的小说主要有《理性环》（*The Circle of Reason*）、《阴影线》（*The Shadow Lines*）、《加尔各答染色体》（*The Calcutta Chromosome*）、《玻璃宫殿》（*The Glass Palace*）、《饿潮》（*The Hungry Tide*）、《罂粟海》（*Sea of Poppies*）、《烟河》（*River of Smoke*）（译者按：高希“朱鹭号”三部曲的第三部《火海》（*Flood of Fire*）已于今年5月出

版）。高希还出版了三本散文集：《阿訇与印度》（*Imam and India*）、《柬埔寨缅甸纪行》（*Dancing in Cambodia and At Large in Burma*）、《紧急时刻》（*Incendiary Circumstances*）。此外，他还定期为《新共和》、《纽约客》、《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刊供稿。高希曾任教于德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女王学院（纽约）和哈佛大学，获得过女王学院和索邦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博萨德酒店采访了高希，就历史书写、历史小说以及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各自的写作技法等话题与他进行了长谈。本文是采访内容的节录。

**马哈茂德·库里亚（以下简称“库里亚”）：**您从儿童时代便开始了“跨国之旅”。您出生在加尔各答，却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长大，我想您也在缅甸生活过。请问这是一位“世界作家”（global writer）想像力生成的必由之路吗？

**阿米塔夫·高希（以下简称“高希”）：**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虽然我的家族和缅甸有很深的渊源，但我的童年时代并未在那里生活过。但这些“跨国之旅”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父亲先是参军，后来从政，在印度驻外使馆工作。无论父亲去哪里任职，我们都随行。孩童时代，我先在孟加拉学习，那时还称东巴基斯坦，随后是斯里兰卡，最后去了印度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你知道，我是在印度独立后出生，如果我的童年时代都是在印度度过，那么南亚次大陆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但作为一个生

于东孟加拉的印度人来说，南亚次大陆对我来说是真是可感。我感觉并非只有印度才是我的家，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是。

**库里亚：**您是在接受了早期教育后来德里的吗？

**高希：**是的。我在德里生活了五年。我在圣斯蒂芬学院历史专业读的本科，然后在德里经济学院研究人类学。从圣斯蒂芬学院毕业后，我决定要工作，便在《印度快报》找了一份工作。实际上，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从德里经济学院硕士毕业。

**库里亚：**然后您就转到了牛津大学，最后去了亚历山大？

**高希：**是的。我在德里学院的成绩很好，于是申请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很顺利拿到了。在牛津大学，我决定要去埃及做实地考察，所以便去了亚历山大。

**库里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您在牛津学习人类学的时候，当时的思想氛围如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想当时牛津大学人类学的两位导师，历史人类学翘楚伊凡·普里查（Evans Pritchard）和师法列维·斯特劳斯、专治东南亚社会研究的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他们的影响依旧吧？

**高希：**这个问题提得好。伊凡·普里查早在我去牛津前便已经离开——他在牛津工作到1970年，而我是1978年去的牛津——当然他的影响力还在，人们还总是谈论他。伊凡·普里查的作品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位作家，一位非常有天分的作家，他从文学转入人类学研究，这和我很像。他曾和F. R. 利维斯一起学习过，而利维斯在当时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更多的是一项文学事业。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对社会科学研究一点兴趣都没有。纯粹是运气使然，我最后去了一个地方，发现那里有我想与之共事的人。我对结构主义方法和其他类似的方法都提不起兴趣来。

**库里亚：**所以您对罗德尼·尼达姆提供的结

构主义方法不感兴趣？

**高希：**我确实读过相关内容，但我到牛津的时候，尼达姆正忙着和牛津其他人类学家辩争呢。不管怎样，我在牛津学习的时间不长。很快我就去了埃及，然后去了北非。由于我的资助快要耗尽，所以实际上，我只用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做。从这个角度说，那篇论文真是一团糟。

**库里亚：**埃及对您有重要的影响吗？我这里说的埃及不仅是因成为您的博士论文“选题”而产生怀旧之情的埃及，也指在您的后期作品中以社会文化背景形式呈现出来的埃及。

**高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在《古老的陆地》（*In an Antique Land*）中曾对此做过说明。我对埃及的兴趣是我在牛津时被激发出来的。人们都期待你选择一个地方去做研究。我刚好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就是印度和埃及的历史材料有很强的相关性，于是我便对寻找这种联系产生了兴趣。总的说来，我的兴趣点一直都在历史上，尤其是挖掘历史联系。

**库里亚：**从学养上说，您是一位人类学家，但您却凭借小说而知名，并且您的虚构性作品很多都有历史指涉。您能告诉我们您是如何由学术研究转到文学创作，从人类学转向历史的吗？

**高希：**我知道这些看起来像是学科间的互相转换，但对我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我一直都对写作感兴趣。我想写小说，同时我也对历史和很多其他事情感兴趣，所以最后它们便都混合在了一起。这些都是我所受教育即思想发展的有机组成。但首先我自认是一个小说家，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如果你读过我的博士论文，你就会发现论文里面基本没有脚注，参考文献也不过两、三页而已。

**库里亚：**您的博士论文出版了吗，或您有意把它出版吗？

**高希：**没有出版，我也无意把它出版。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都不是一部标准的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著作。有人甚至针对我的论文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但那真不是一篇标准的社会科学或

者人类学论文。

**库里亚**：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写作历史小说而不是进行学术史研究？

**高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之所以对写作学术史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那将涉及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首先，我对作品中的角色、群体中的人以及单独个体的经历感兴趣，历史不过是背景而已。但写历史小说和书写历史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历史如一条河，历史学家是在研究河流动的方式以及河中各种或隐或现的浪潮。但在这条河里，也有鱼的存在，它们可以在各个方向自由游弋。所以，我便选择从鱼的视角、鱼游动的方向来观察这条河，但最终我还是对鱼自身充满了兴趣。小说家通过作品人物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做法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区别。对我而言，透过人物的棱镜来看待过去，能帮助我理解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会忽视的一些方面。但我必须承认，如果不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基础，这么做是不现实的。

**库里亚**：您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核心文化地理场域，当然，毋庸置疑，这个场域是印度洋。您是如何对航海与海洋世界产生兴趣的？

**高希**：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但现在当我回顾我的文学生涯时，我发现我在开始文学创作时，便已涉及跨印度洋旅行这一题材。我的第一部作品《理性环》的核心章节是关于一群正向海湾进发的喀拉拉邦人的故事，而当时我正在喀拉拉邦工作，任职于“锡鲁万纳塔普拉姆发展研究中心”。但这仅是与印度洋关系的肇始而已，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有时候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也是真实意愿的不自觉流露。虽然这从来不是一个有意的尝试，也非有意识的写作计划，但当反思过去的时候，我意识到对我有巨大吸引力的地方恰恰是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印度洋，还有这些地区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库里亚**：如您在别的地方提到的，如果是它们国际化的文化特质吸引了您，那您为什么没有把注意力放到陆路的商贸网络呢，它们不是也同

样具有国际化特征吗？

**高希**：不管怎么说，陆路的交通与网络就是无法引起我的兴趣。

**库里亚**：您在创作每部作品时都做了档案查阅工作。您这么做是因为您力图使文本和语境都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您又把想象力置于何处呢？

**高希**：想象力并不是一种流动的实体（floating essence），它开始于时空中特定的节点。对我而言，研究工作通常能激发创作灵感，引发我的思考。它从那里开始，也在那里持续下去，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把想象力和研究区分开来。至于我最近的小说，我不得不进行很多的历史研究，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我是说历史学家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针对鸦片贸易的历史著作很少，其实这很奇怪，因为鸦片贸易迟至20世纪20年代，都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鸦片贸易在印度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亚洲而言，鸦片战争是一个改变了整个大陆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但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带来的灾难并非广为人知。中国人关注并见证了殖民主义蚕食亚洲和非洲大片土地的过程。它以贸易的形式来到，但这种贸易是攫取土地的先遣军，先是通过赠与的和平方式，然后便诉诸武力。

我读了很多关于广州的历史专著和研究成果，但我还是对我最渴望知道的内容缺乏了解：出现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会是什么样呢？我想要进入过去，生活在历史的时空里。我进入过去的方式是以自问的方式来实现的：如果在特定时刻身临历史事件的现场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这个问题带着我去查阅档案，参考各种回忆录、报纸、日记、信件和其他的一手资料。

**库里亚**：很明显，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为了研究的需要，您一定已经查阅了世界上大量的档案资料。对您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哪些档案最能引起您的兴趣？

**高希**：很多档案资料都很有趣。毛里求斯的圣雄甘地博物馆有很好的档案资料。毛里求斯

的国家档案馆也很吸引人。格林尼治国家海事博物馆是另一个了不起的档案馆。但对我最近两部作品最有帮助的档案馆是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档案馆。

**库里亚：**历史想象之外，您还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和阐释档案材料？

**高希：**我把它们混合起来用——因为写作和研究两者无法分离开。在我完成一个人物形象塑造之前，我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只有在开始写作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我需要知道什么，这就推动了研究的开展。我写作和研究同时进行，这便是为什么我的工作方式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的原因。假如我在描绘一个人物，而他正在海上航行，那么对我来说，船的类型和形状以及人物的衣着和语言都是重要信息。总体而言，这些都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人物带来了需要我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作品中的人物为我指明了研究方向。

历史学家是围绕一个命题来研究过去的。如果他们在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比如说贸易领域，他们就对人物的语言交流和地区的气候没有兴趣。他们会对某些类型的通讯方式和商业交往感兴趣。但对我来说，当我在描写19世纪广州的时候，我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服饰、商务往来，因为我正设法想象出他们生活的全部场景。我并非仅仅要完成一个题目的写作。我设法了解气候特征、天气变化以及他们的饮食习惯等。这样，我作为一个作家努力去做和不得不做的事情就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内容有着明显的差异——我是在想象发生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的情景。也许唯一采用此种方法来研究过去的学科是军事史研究，尤其涉及战场描述的时候：军事史家描述天气、地形、服装、装备、精神和身体状态，以及其他任何能够影响战斗结果的因素。这些和其他一些共通点既引起了军事史家的兴趣，也同样吸引着小说家。

**库里亚：**在把想象力应用于具体分析时，您是如何处理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中心主义，或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问题？

**高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我想都无法绕开民族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些问题。我强烈认

为必须设法通过当事人的视角去看待过去，当然这很困难、很复杂。“在场”（Presentism）总是一个问题。我对过去着迷，是因为过去能为我提供人类处于困境中的具体事例，这些例子独特且不会重复，比我所能虚构的任何事件都更能说明人的处境。透过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小说人物，我追寻着这些历史事件。

**库里亚：**您在别的地方曾说过您（从档案资料中）发现您想知道的答案。这其实是指什么？

**高希：**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通过小说人物来近距离地考察某些历史事件，因而有些问题便无需去考虑。比如说，我的小说人物是一个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那么我就不需去了解一百年间鸦片价格的波动。这些信息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对我来说，当他在某地进行贸易时，鸦片的价格及价格的波动才是重要的信息。这样的取舍自然为研究工作设定了一个范围。可以拿我在研究人物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所关注的内容为例：我关注他们的饮食、他们的娱乐与休闲活动、他们的日常生活等。我努力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献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当我掌握了这些信息，我才会令人信服地构思作品的情节和语境。

**库里亚：**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写作《遥远的陆地》，您主要研究开罗藏经库的记录（Geniza records）。在当时，这些记录尚未被充分利用起来，即便在海洋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除了戈伊坦（S. D. Goitein）的研究，这些记录被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您能说明一下您对这些记录的研究吗？

**高希：**那时我已经掌握了阿拉伯语，但我必须要学习犹太—阿拉伯语（Judeo-Arabic）。它是阿拉伯口语的一种变体，以希伯来文写成，学习这门语言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文本的拼写方式。这些都是手写的文字，所以实际上我是在和这些纸打交道。阅读、理解、翻译这些材料是很辛苦的工作。虽然戈伊坦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当时我无法获得他的研究成果。这样我就不得不自己译解文本，这段经历我在《遥远的陆地》中做过描述。

**库里亚：**自从您开始写作历史小说，您已经掌握了多门语言，这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尤其在查阅档案资料的时候。您现在已经掌握了多少门语言？

**高希：**我想我掌握了五门语言：孟加拉语、印度语、法语、阿拉伯语和英语。我也曾学过犹太—阿拉伯语，但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认可它是一门语言。相较于欧洲学术研究对语言的要求，我的几门语言也仅是差强人意而已。很多学者都能熟练运用多门语言，比如德克·柯尔夫教授（Dirk Kolff），他会荷兰语、法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还有何英成教授（Engseng Ho），他懂汉语和阿拉伯语。我想这是研究印度洋地区所必需掌握的技能。印度洋地区的语言呈现多样化特征，任何想要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都要首先学习语言。为了新书的写作，我开始学习广东话，但我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语言知识来使我的表达更加充分自如。

**库里亚：**档案资料之外，还有什么方法或资源您可以用来重现过去吗？

**高希：**我还看很多的语言记录，因为我对语言非常感兴趣。我也设法和人们交流，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我小说所涉及历史语境的人。

**库里亚：**您在书中描绘某个地区前，经常会去实地考察，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吧。

**高希：**我喜欢去参观一些地方，来弄清楚它们是什么样子。在我的书中，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小说中的角色。例如，我在广州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即使经验丰富的西方旅行家，也被它的独特性与陌生感所震撼，所以他们总是在谈论这个地方并乐此不疲。广州的先贤清真寺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由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建造，保存的很好，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去那里朝拜。所以，广州城本身也是我近期作品中的角色。

**库里亚：**您笔下的人物来自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您是如何研究由其他语言写成的档案资料，并把其内容通过英文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呢？这是否给您造成过困扰？

**高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环印度洋地区有太多的语言和方言。我这么说不仅是指广义的印度洋地区，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也指一艘船这样具体的场合。船员来自哪里的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仔细对待这种多语言的环境。在写作中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使用了英语的各种变体和方言形式，既有现代英语，也有早期现代英语。幸运的是，从19世纪开始，英语便有了各种丰富的方言形式和记录。

**库里亚：**您的一些作品跨越了众多时间阶段。为什么您要把不同的时间段通过“时间逆转”（chronological whirlwind）整合到一个情节里呢？

**高希：**为什么不呢？这使故事和情节都更能吸引读者。

**库里亚：**上一个问题是由我历史学的专业兴趣引发的。既然历史学家通常都研究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我想知道职业历史学家是怎样看待您的作品的？

**高希：**其实他们都对我的作品做出了不错的评价，给予了很好的回应。你知道，我根本无法相信自己会被剑桥大学邀请去和娜塔丽·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进行对话，她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当然我们的谈话很带劲。我也曾被一位极富魅力的科普特史专家约翰·保罗·高波艾拉（John Paul Ghobrial）邀请，其时他正在进行着一项极其有趣的研究工作。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最新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表明，喀拉拉邦与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在中世纪时就有联系。一位匈牙利学者，伊什特万·佩尔采尔（Istvan Perczel），在喀拉拉邦挖掘出大量新发现的教会记录。他的发现证明了那里与叙利亚基督教会的联系。很明显，叙利亚的教会与喀拉拉邦教会之间的联系很紧密。它们之间往来不断，还经常有信件上的交流。直到今日，叙利亚还有由喀拉拉邦的教士管理的教堂。佩尔采尔教授已经成功发掘了很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出版了。今年四月，我在我的主页上对此做过简评，同时也给出了一些相关的网页链接。

**库里亚：**有历史学家对您作品的主题、情

节、情感或者准确性问题提出过质疑与批评吗？

**高 希：**我想至少西方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即使印度的历史学家并非如此），是通过阅读历史小说或观赏电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这是引发人们对历史产生兴趣的方式。我发现历史学家倾向于阅读很多历史小说，因为这些小说使他们正在写作的内容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很多我曾经使用过研究成果的历史学家对我说，我引述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著作带来了光彩——因为这给了他们的著作以意义与历史情境。我不会宣称我的东西完全准确，又有谁敢说自已完全准确呢？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是全知全能、神一样的存在。我会尽力去做好，但一定会存在各种错误与欠缺之处。但我想历史学家看得出我已经力图准确；我已经竭尽全力去试图达到准确状态。我想他们很欣赏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为达到这一点所需付出的艰苦努力。

在美国和欧洲，历史学家当然会去阅读历史小说。在印度，很多人是通过社会科学知道了历史，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通过阅读小说了解了历史。不过，我突然想起了我在写作《遥远的陆地》时经历的一件事。我把草稿给了一位朋友，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读过之后，他要我把这部书稿扔掉，并评论说我把写作的精力浪费在泛滥的情感上。我们应该承认，在历史长河中情绪施加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对特定时刻特定事件，它们确实曾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库里亚：**在您的作品中，暴力与战争都有重要的位置。在您关于印度洋地区的作品中，这种“侵略模式”（aggressive modes）是欧洲身份的一个表征。为什么会如此？我记得沙希·塔鲁尔（Sashi Taroor）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对《罍粟海》的评论中说到，通过这部小说，您对“恶棍”殖民机构（“Vallainous” colonial entrepreneurs）持一种不原谅的态度。这是您在描写暴力时的想法吗？

**高 希：**我认为这样的评论很荒谬。我写过有关水手、士兵和劳动阶层的内容。你认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中产阶级群体的想法往往有些一厢情愿。他们会想到他们的英语老师，那些善良优雅的人，想起他们经常轻轻拍打自己头

顶的样子。当然这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但那不是我要描述的社会现实。我笔下的人物是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他们狡诈、残忍、难以对付。有时候我会想，现代人的精神已经变得有些软弱了。由于无法进入到过去，他们便拒绝去思考生活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为数不多的、18世纪保存下来的船只中的一艘，现在就藏于阿姆斯特丹。只要你进入那艘船四下看看——你就会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在那艘船上航行会是什么状态。甚至只要看看那艘船的大小便足够了：房间极其狭小，几乎没有给人留下移动的空间。如果你读过任何一艘船的航海日志，你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互相杀戮，鞭挞、谋杀、殴打等残忍的情景一直在船上上演。你认为那些人会是性格温良的人吗？这不是一个什么都发生在画室里的世界。那时的生活野蛮而又艰难。你心目中的奴隶贸易是什么样？你又怎么想象契约奴的生活呢（indenture）？

**库里亚：**那么您笔下的暴力和殖民主义没有任何联系吗？

**高 希：**我书中最暴力的人物往往是印度人。苏比达（subedars）<sup>①</sup>总是在殴打别人。这是客观事实。我认为印度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作品是荷兰的德克·柯尔夫教授的《奴隶、王子与士兵》（*Naukar, Rajput and Sepoy*）。这部作品即使不是过去二十年里印度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两三部作品之一。柯尔夫完全改变了人们倾向于以感伤的方式看待历史的做法。他告诉我们，印度，尤其是印度北部，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那里的人如果不是士兵或暴徒，便以某种形式受雇于人。那是一个充满冒险家的社会，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战场上度过；那是一个纷争不断的时代，绝不是一个和平的农耕世界。当农民去田里劳作的时候，他们会带上长矛以自保。农耕、冲突与军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那个时代的印度充斥着暴力。印度的士兵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士兵都要多。他们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那本书应该成为大家的必读书目，它一定会颠覆人们对印度史的认识，使人们不再执着于彼时的印度是一个静态农耕社会的想法。

**库里亚**：不考虑《遥远的陆地》中的内容，前殖民时代印度洋地区的人们是否拥有平静祥和的生活呢？

**高希**：如果你读一些航海日志或者水手的记录，您就会知道当时航海是什么状态。水手的航海生活通常大约从九岁开始，做船上的跟班。他们经常被打，遭受着非人的虐待。当他们十三、十四岁的时候，便和身边的人做着同样的工作。你若读一下19世纪的水手日志，就能想象出当时水手极其糟糕的生活状态。如果你去看我刚才提到的那艘船，你就会发现船的桅杆距离甲板有一百尺高。作为一名水手，当船在海上颠簸的时候，他要在桅杆顶端工作，那充满了危险与暴力。这些水手很少有人活过三十岁。无数记录再现了水手在船颠簸时摔下来的情况：如果掉到海里，那就彻底没救了，船无法及时掉头去把他救起；如果掉到甲板上伤到手，那便无法再工作，他的航海生活也随之结束。大量的记录显示，很多水手在手受伤后便自杀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已经结束了。那是一个很灰暗的时代，充斥着令人无法置信的凶残与野蛮。我书中所写的内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进行了美化。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向现代人解释这一切，因为现在的读书人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想象这些社会现实。

**库里亚**：当您通过这些严酷残忍的场景来重访过去时，是阿米塔夫·高希您这个人，还是作为学者的您在这么做？

**高希**：两者兼而有之吧。当历史学家在阅读历史文献，比如说航海记录时，他看重的是抽象的内容和数字。但我却在思考那段经历对亲历者，例如一个东印度水手（lascar）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知道东印度水手是怎么招募的吗？他们基本是被绑架来的。其他的水手也是如此。你知道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的英国水手是如何招募的吗？船长们一般会贿赂酒馆的主人，让他们对进来喝酒的人下药，然后把处于混沌状态的酒客带上船。当那些酒客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在海上航行半日了。这种做法有个专有名词叫“绑架船工”（shanghaiing），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才消失。当兵相对于水手在船上的恶劣

生活来说是很轻松了。水手们挤在那些小船里。如果你看看当时船的外形，你就知道它们比普通的几间房子大不了多少——但却有上百人塞在里面。他们要在船上挨过四年艰苦的时光。你能想象这种难熬的日子吗？

**库里亚**：您最近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中，只谈了环境变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您担心大量历史遗迹的生存危机吗？您还特别谈到了希腊的历史意义？

**高希**：我们可以忘记那些历史遗迹，它们基本已经消失了。我认为它们不会被保存的很久。看看窗外的这条运河，想想阿姆斯特丹还能持续多少年免于水患的侵扰？如果海平面上升三四米，现在看来这几乎已经确定无疑，所有这一切都会消失。我很欣赏荷兰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为此做好准备。令我震惊的是，在印度，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就在昨天，有人给我发了个链接：恒河与印度河三角洲沉陷的速度是海平面上升速度的四倍。是四倍啊！如果海平面上升半米，那就意味着还要在加上两米的上升高度。仅在孟加拉湾区，一亿人生活的区域与海水仅有一米之隔。一亿人啊！印度河三角洲也同样糟糕，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孟加拉湾区盛产大米，但现在因为河水改道，咸水渗透到耕地中去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很快，现在还能耕种的地块也会变得无法耕种，这已经在孙德尔本斯的大部分地区发生。对印度公众来说，世界上重要的事情只有板球和宝莱坞，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破坏程度毫无思想准备。

**库里亚**：是什么因素促使您认为全球变暖比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更加危险，后两者可直接威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呀？

**高希**：对这个问题，我有两点要说。第一，与正在发生的环境问题的本质相较而言，恐怖主义与选举等都是次要问题。与我们现在面对的地壳层面的绝对变化相比，那些问题太微不足道。第二，我们看到的很多冲突，即使是南亚内部的冲突，也都和环境变化有很大的联系。尼泊尔的毛主义来说，我读过的一个研究报告称，

毛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尼泊尔的降雨减少有直接关系。印度恰蒂斯加尔邦与奥里萨邦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冲突中，气候变化都发挥了作用。降雨量的急剧变化，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亚洲，尤其是印度来说，问题却是，人们似乎根本没有从全球变化及其毁灭性后果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

**库里亚：**虽然总的说来您不是一位争议人物，但您的一些立场，尤其是在接受和拒绝某些奖项方面，确实使您一度成为报纸上的头条人物。我在想您从“英联邦作家奖”评选中撤回了《玻璃宫殿》，但却接受了丹·大卫奖，您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高希：**如你所说，我不是一个自寻争议的人。但当生活让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時候，你只能竭尽全力去解决好。我接受丹·大卫奖相对来说不应有太大争议，但却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已经长篇累牍地对此阐述了我的观点。我也明确地阐明了我对文化抵制的看法：我不相信这种抵制会奏效。国际笔会——全球作家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也反对这种做法。并且，当时我就提到了这个问题：“难道我对某人所受伤害的同情意味着我必须使自己的判断屈从于他们、放弃其他信仰与责任吗？”最重要的是，这个奖项不是由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而是一个和特拉维夫大学合作的私人基金授予的。

**库里亚：**无论您是写作还是做报告，您总是以全球视野来谈论问题。这方面您是不是受了普世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泰戈尔的影响？你们两个人同属于加尔各答文化圈。

**高希：**作为孟加拉裔，阅读泰戈尔的作品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越是审视

他、他的人生、他的作品，越是觉得他有先见之明。他远见卓识，为印度建立了跨亚洲的联系，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和日本之间。他对这个世界有着惊人的感知力。与班吉姆·查特吉（Bankim Chandra）等人不同，他不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工业化和环境等问题却有着本能的把握。

**库里亚：**您的非虚构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是来自您人类学专业训练的渴求，还是出于反映当代问题的动机，如您在《阿訇与印度》和《紧急时刻》所展现的那样？

**高希：**我想我会选择后者——这和我的人类学写作没有任何关系。

**库里亚：**自去年开始，便有计划和马哈茂德·法鲁基（Mahmood Farooqui）和阿努沙·里兹维（Anusha Rizvi）一起把《罌粟海》搬上银幕。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高希：**那不是我的主意，但他们计划这么做。他们已经写了一个很好的脚本，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投资方。我很喜欢马哈茂德的脚本。我给你讲个事儿。马哈茂德问我“朱鹭号”的大小，我告诉他有一百尺长，可以容纳二百人，但他不相信我的话，说这不可能。但实际上我已经把船的尺寸说大了，真正的船不会超过八十尺。看吧，这就是今不如昔的地方。

#### 注解【Notes】

①苏比达：殖民时代，印度士兵在英军团中所能获得的较高军阶。

（译者简介：金万锋，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记忆研究。）